

人生漫談

馮定著

171
3130

人生漫談

馮定著



中国青年出版社

1964年·北京

人 生 漫 論

馮 定 著

*

中 國 青 年 出 版 社 出 版

(北京东四12条老君堂11号)

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證出字第036号

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經售

*

787×1092 1/32 4 8/4 印张 89千字

1964年10月北京第1版 1964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定價(7)0.42元

出版者的話

現將馮定同志的《人生漫談》出版，供讀者研究和討論。

1964年10月

小序

書，在头里常添有几句話，或者說明寫書的緣由，或者說明寫書的經過，或者簡單介紹內容，或者約略申述要旨，等等，目的都是使讀者讀起正文來較為方便些。這種开头的几句話，按照我國歷來的習慣，叫做序。所以，我在这本小書的头里，也写上几句小序。

1956年間，我曾為中國青年出版社寫過一本《共產主義人生觀》。大概是因為這個緣故吧，近來接到不少青年的來信，提出好些有關人生的問題，要求我答復。有的，我回信答復了；有的，而且是多數，由於种种原因，沒有能够答復。來信沒有能夠一一答復，心里總是覺得很歉仄。青年同志對於人生問題如此感興趣，提出這麼多的問題，要求我解答，加上自己深感原來寫的那本《共產主義人生觀》，道理講得很不夠，因此，很久以來，我就想改寫那本書。現在，我終於動筆了，還得感謝青年朋友的督促和鼓勵。

談人生問題，很不容易，談得不好，往往落入“個人”的羅網或圈套。比如，為了使青年同志容易接受真理，往往會從其個人利益的設想出發，說就是為了個人利益，在生活的

CAA50/03

过程中，也必須努力参加革命的斗争，努力参加革命的工作，并且在斗争和工作中，努力学习和修养，逐渐确立革命的人生观，等等；这样的说法，实际上，首先就多多少少落在个人主义的罗网或圈套里了。谈话要既使青年同志容易接受真理，又摒除个人主义的“魔障”，这是极为细致的，极为微妙的，所以也是很不容易的。

我在写《共产主义人生观》的时候，是注意了不要落入个人主义的罗网或圈套的。所以，当时我就不从人生而谈人生，而是在讲了资产阶级人生观和无产阶级人生观完全对立以后，就讲辩证唯物的世界观和辩证唯物的历史观，最后才将有关人生的几个具体问题讲了一讲。有了正确而明确的世界观和历史观，许多抽象的或者具体的有关人生的問題，也就容易解决了；离开世界观和历史观来谈人生問題，怎么也是谈不清楚的。这回重写，也还是遵循上述的原则，以世界观、历史观为经，以有关人生的具体問題为纬，进行分析和阐述；末了，再归总谈谈人生观。

谈人生問題，很不容易，这是我所知道的。但是，人生問題既是现实的問題，是青年们爱想、爱谈的問題，那么就不该避而不谈。既然谈了，当然要尽力、负责而谈，使谈话能够产生良好的效果。当然，我这次谈的，比起前次谈的，究竟是不是更完善了和更恰当了，这是很难說的。因为任何問題，个人的經驗和思考，总是有限的。这里，我只有向广大的读者求助了；读者如发现有谈得不妥当、不完善的地方，希望能够指点出来，以便使我有所启发，有所改正。

这本小書，采取了“漫談”的方式，一共談了十六次。各次談的問題，列舉如下；讀者“一目”就可“了然”，所以沒有另立“目录”的必要了。

初 論	怎样談法
再 論	自由
三 論	实践
四 論	真理的标准
五 論	劳动
六 論	革命
七 論	党
八 論	生活
九 論	学习
十 論	工作
十一談	意志
十二談	感情
十三談	道德
十四談	生死
十五談	自覺能動性
末 論	人生觀

初談——怎样談法

本書是談人生問題的，先來談談**怎样談法**。

人生，對青年來說是大事。在青年時期，人生的历程還剛剛開始；所以青年愛想、愛談人生的問題，這是很自然的。

談人生問題，可以談得簡單些，也可以談得複雜些。但是，要談得簡單却不浮淺，談得複雜却不煩瑣，可不容易。所以“怎样談法”，就成為問題中的問題了。這回，我們還是初談，那麼先來談談問題中的問題，就是“怎样談法”的問題，大概是必要的吧。

怎样談法，似乎應該從兩個方面來考慮：一是從方式方面來考慮，一是從實質方面來考慮。一般說來，方式和實質有密切的關係，兩者是相稱的。但是，方式和實質終究有所不同；所以，并不能因此得出結論；從實質方面來考慮，人生問題是極為嚴肅的問題，因而談人生問題的方式，也就愈嚴肅愈好，以至變成愈拘謹愈好。我說的相稱，是說應該抓得住問題的實質，將內容談得比較明白些，比較清楚些。因此，我在此，不想“整襟危坐”而談，“引經據典”而談，而採取“漫談”的方式。“漫”的意思，是指談的方式比較輕松些，

比較隨便些，使得談的人不致那麼緊張，聽的人也不致感到枯燥，但決不是指談的實質是拉拉扯扯的，拼湊搭搭的。總之，“漫談”二字中“漫”的意思，是和什麼“散漫”、“浪漫”等等，全都不相干的。

怎樣談法，從方式方面來考慮，問題比較小，而從實質方面來考慮，問題就比較大了。從實質方面來考慮，有關人生問題的談法，不外兩種：一種是將個人和社會、階級分離開來，而且談得比較抽象；一種是將個人和社會、階級結合起來，而且談得比較具體。這兩種談法，是大不相同的。究其不同的根源，首先在於對人的社會性和階級性，抱有不同的態度，持有不同的意見。誰認為人是有社會性、階級性的，自必會採取和社會、階級結合起來的談法；誰認為人是沒有社會性、階級性的，自必會採取和社會、階級分離開來的談法。社會性和階級性，是有密切關係的。從邏輯觀點來說，不承認人有階級性，還不是同時也就否認了人有社會性；但是不承認人有社會性，可正是同時也就否認了人有階級性。因此，我們先談談人的社會性，再談談人的階級性，問題就比較容易解決了。

大家知道，人類是由愛好“勞動”的類人猿群進化而來的，從來過的就是群居的生活。不過人類已經能夠製造工具和使用工具，所以其勞動已經不是猿群那樣簡單的勞動，而是社會性的生產勞動了。人類在社會性的生產中，彼此不管是平等的好，或者是不平等的好，總得發生密切的關係，單獨生活是根本不可能的。這就是人有社會性的最

根本的原因。我国战国时代的末期，有位伟大的唯物論者，姓荀名况，就曾經說，“人之生不能无群”，說的正是这个道理；这里的“群”正好就是社会的意思。人的語言，原是在社会性的生活中，首先是在社会性的生产中，因为彼此有交換意見的迫切需要而出現的；随着生产的发展，語言愈益发达，思想也愈益丰富了。这就是說，人的物質生活是社会性的，人的精神生活也是社会性的。

人的物質生活是社会性的，这从人离开了社会就无法生存，就可說明。十八世紀初，英國資產階級作家笛福，曾发表一本小說叫《魯滨逊漂流記》，描写魯滨逊弃家經商，航海遇险，飘流在孤島上，不但仍能生存，而且后来还拥有了許多产业。这是在資產階級新兴时期，鼓吹資產階級冒险去开拓殖民地和剝削殖民地人民的一本書，意在宣揚資本主义和資產階級式的“个人奋斗”。但是，这本书也正好証明，人是不能离开社会而生存的。魯滨逊起先还是从破船里取来了几件工具和一些粮食，这些都是社会性劳动的产物，这实际上表明了人完全不依賴社会是不可能的。

也許有人会問：在我国的旧时代里，不是有人隱居深山，隔絕紅尘嗎？是的，在我国的封建社会里，确实有人为了什么“悟道參禪”，或者为了什么“修仙成佛”，在深山丛林里孤居独处。这些人为什么有这样的思想行为呢？不外乎是因为迷信，或者因为在爭夺权位名利中失了意，或者因为对現社会不滿却缺乏斗志，借此来表示对現社会的微弱反抗罢了。这些人不是厌世，就是憤世，全都是从个人的立場

出发的。他們的行为对改造社会是毫无作用的。其实，他們并不能同世人隔絕。他們孤居独处，不外有两种情况：一种是只和外人不大接触，而实际上还是受人“供养”、讀書写字，穿美吃好，过着寄生的生活，仍然依賴社会而生存；一种是像商朝末代的伯夷、叔齐似的，相传他們在武王伐紂而得了天下时，“耻食周粟”，隐在首阳山上，采薇而食，和麋鹿为伍，終于活活餓死了。

人的精神生活是社会性的，这从人离开了社会就有孤独感，就可說明。人是世世代代过着社会性的生活的，所以一旦离群索居，断絕了和人們的往来，那怕是暫时的、短期的，也会有孤独之感。不仅这样。人的孤独感，离开了社会固然会有，就是不离开社会也是会有的。人总想将思想向別人表达；逢到愉快的事而有人共鳴就格外兴高采烈；逢到苦恼的事而有人同情就会觉得輕松了些；否則，精神上就不免感覺孤独了。沙俄时代的作家契訶夫，曾經描写一个馬車夫死了一个独生的儿子，因为沒有什么人可以与之訴說，所以只好源源本本向馬訴說。魯迅的小說《祥林嫂》，她的儿子被狼吃了，于是逢人便訴說，一直訴說到邻里的人都背得出来而表示厌煩了，还是在訴說。这种求人共鳴或同情的心境，正是从反面表示了人是不甘孤独的。这些，說明人的精神生活是社会性的，恐怕再深刻也沒有了。

人，不論从物質生活來說也好，不論从精神生活來說也好，都是社会性的；这已是毫无疑义的了。現在我們再來說一說：人不但不能离开社会而生存，而且当社会的发展已使

生活繁杂的时候，要想再回到簡陋的生活里去，也是徒劳的。这是因为人們总是不断地在进行社会性的生产，所以社会总是不断地在发展着。社会在向前发展的过程中，虽然也会有或大或小的波折，但是从其总的趋向來說，生产力总是由低而高的，因而，生活（包括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）也总是由簡陋而繁杂的。如果生长在繁杂的社会里，幻想社会倒退而重过簡陋的生活，不光是办不到的，而且是反动的。我国春秋时代的末期，有个老子，因为对于当时大国兼并小国，强国欺凌弱国，爭土夺地，擄人掠畜，使得大家的生活不得安宁，觉得很不好，所以主张“小国寡民”，造成“邻国相望，鸡犬之声相闻，民至老死不相往来”的局面。这种局面，实是对于原始氏族社会或部落社会的留恋和怀念，是希望历史开倒車，所以是办不到的，也是反动的。晋朝时候有个陶潛，字渊明，因为不满当时的社会，写过有名的《桃花源記》，幻想有那么一个与世隔絕的小社会或小天地，人們过着勤劳朴素的生活。陶潛的思想和老子的思想在这一点上是相似的，同样是办不到的，反动的。

人既然是社会性的，那么当社会已經出現了阶级，成为阶级社会的时候，人們不是属于这个阶级，就是属于那个阶级，因而既具有社会性，又具有阶级性。原始社会是没有阶级的社会，将来必会在全世界实现的共产主义社会，也是没有阶级的社会。然而，自从奴隶制社会形成之后，人和人之間就出現了剥削和被剥削、压迫和被压迫、統治和被統治的关系，于是人們就在统一的社会里，被划分为阶级而对立起

來。有了階級，也就有了階級鬥爭；而階級鬥爭，在有階級的社會里，就成為促使社會前進的動力了。無產階級在社會主義革命勝利和無產階級專政建立以前，是要和資產階級進行階級鬥爭的；在社會主義革命勝利和無產階級專政建立以後，還是要和資產階級進行階級鬥爭的，不過現在無產階級已經居在統治的地位，因而鬥爭的情勢已經有了翻天覆地的變化，同以前大不相同了。誰生長在有階級和有階級鬥爭的社會里，誰就有階級性，誰就不管自動或被動得去從事階級鬥爭，而無法避免。這是只要稍微翻閱一下人類的歷史，稍微觀察一下人世的現實，就可了解的。至于從個別的人來說，在尖銳的階級鬥爭中，脫離其原來所從屬的階級，轉向其他的階級，並不是不可能的。現實生活中這樣的事例是很多的。有的反動階級出身的人歸向了革命的先進階級，也有極少數人從先進階級投向了反動階級而成為叛徒。個別的人的這種轉變，並不否認階級的存在；不否定人是有階級性的這個真理。

人有社會性和階級性，這是鐵的事實。資產階級的學者和作家，一般是只談社會而不談階級的。他們認為社會不過是由一個人、一個人集合而成的，否認社會是在運動、變化、發展的，更不理解社會發展的動力所在。資產階級的學者和作家，當階級鬥爭已趨激化，階級存在的事實已無可否認的時候，就只好承認階級的存在，却竭力否認階級鬥爭的必然性和必要性，主張階級調和，以欺騙和麻痹無產階級，使無產階級甘願居在被剝削、被壓迫、被統治的地位，而

不去进行无产阶级革命、实行无产阶级专政，不去谋取彻底的和全面的解放。其实，这正是资产阶级欺骗和麻痹人民，向无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的一种手段，这正好说明阶级调和论是骗人的鬼话。现代修正主义者极力宣扬的所谓“和平共处”、“和平竞赛”、“和平过渡”，正是资产阶级的“阶级调和论”的翻版。按照他们说的那样做，结果会使无产阶级的斗争，完全被束缚起来，决不会触犯资本主义制度的一根毫毛。所以，修正主义是资产阶级的社会支柱，他们在工人阶级内部，配合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。

人是有社会性和阶级性的；因此，谈人生而不和社会性、阶级性相结合，正是要使青年脱离当今世界的现实，首先是脱离革命运动在全世界“方兴未艾”的现实，这实际上就是卫护了已临最后总崩溃的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。这正是帝国主义和反动资产阶级求之不得的。所以，我们的谈人生，从实质方面来考虑，必须和社会性、阶级性结合起来。同样的道理，我们的谈人生，也不想先从“什么是人生”等抽象的问题谈起，因为那样谈，仍会脱离现实，很容易将青年引入虚无缥渺的领域，甚至无意中会落入帝国主义和反动资产阶级“求之不得”的陷阱了。所以我们的谈人生，既要结合社会性、阶级性，又要先从具体的問題谈起。这样，如像“人生是什么”等等抽象的大問題，当着具体的問題一个一个解决之后，也就“迎刃而解”了。

现在，我们已将“怎样谈法”谈妥了，下面就按照上面說的談法，一个問題一个问题來談吧。

再 談——自由

這回，我們談談**自由問題**。

誰都想自由。不過我們說的自由，決不是資產階級所標榜的自由。資產階級在世界資本主義的初期，為了推翻封建制度，使得資本主義不受封建的專制政治和行會組織等等的束縛，而能順暢發展，曾經提出“自由、平等、博愛”的口號，這個口號，在當時是起過進步作用的。但是，我們必須認識到，資產階級所要求的自由，從其實質來說，無非就是買賣的自由，雇佣的自由，開拓殖民地的自由，以及彼此在市場上有競爭的自由等等罢了。當資產階級依靠工人、農民的力量，推翻了封建統治而取得政權以後，他們所標榜的自由，就成了階級剝削、階級壓迫的同義詞了：只有資產階級剝削和壓迫工人階級的自由，而沒有工人階級的自由；只有資產階級掠奪和侵略弱小民族的自由，而沒有弱小民族的自由；只有資產階級反革命的自由，而沒有廣大劳动人民爭取解放的自由。資產階級的自由，是從極端的個人主義出發的，是以別人的不自由作為代價而取得的。資產階級的生存，是建築在劳动人民的血汗和不自由上面的。在

資產階級內部，在資本家和資本家之間，也是遵循着“大魚吃小魚”的原則的：誰能發財致富，不管其手段多么卑鄙醜陋，誰就是有本領的；誰失敗了，傾家蕩產了，誰就是活該。我們关心的，決不是這樣的自由；我們关心的，是在為革命事業而鬥爭中，在為社會主義建設事業而工作中，有沒有自由，能不能自由，以及有關的問題。或者說，我們要的是無產階級徹底解放的自由，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自由，實現共產主義的自由。能不能有這種自由呢？能。因為這是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，認識和掌握了這種客觀規律，就有了自由。這種自由能夠順手得到嗎？不能。這種自由，是人類經過了亿万年的進化和几千年的生產鬥爭和階級鬥爭，直到馬克思創造了科學的馬克思主義學說，亿万工農勞苦群眾在馬克思列寧主義學說的指導下，英勇地進行了偉大的革命鬥爭，並且還要將這個鬥爭進行到底，才能徹底取得的。

為了弄清上述問題，咱們先看一看自由和思想的關係。

大家知道，人的初生是不會思想的；但是當人已會思想的時候，往往是先思想、後行動的。想的什麼，而做的結果和想的正好相同，至少大體相似，比如種瓜而得瓜，種豆而得豆，經過科學實驗，認識了某个問題或者獲得了某種科學方法，諸如此類，就覺得自由了。當然，自由不自由，不能光從一時、一地、一事、一次來說，甚至也不能光從一人成功或者失敗來說。大家知道，許多科學的試驗，農作物新品種的試種和工業新產品的試制，往往是經過上十、上百、上千

次的失敗而后才有成果的；有些成果，还是先輩积累了世世代代的經驗而得来的。又如革命事业，也总是要經過无数次的失敗才获得最后的胜利的。不少革命者在革命的过程中光荣牺牲了，沒有能够看到革命的胜利。但是他們懂得社会的前进是誰也阻挡不了的，广大人民群众总是会覺悟、要斗争的，深信最后胜利是必然的，因而，虽然他們的一生是短促的，然而在这短促的一生中，始終是感覺自由的。帝国主义者、一切反动分子，虽然猖狂一时，显赫一世，然而因为他們的所作所为都是和广大的劳动人民作对，和历史的前进趋势作对，最后总是逃不脫沒落和崩潰的命运，所以日夜处在“愁城”之中，始終是感覺不自由的。

由此說來，自由是和思想有密切的关系的。沒有思想，根本沒有自由不自由的問題；有了思想，也就有了自由不自由的問題。因此，我們为了对自由有个比較正确的認識，再来談談人类思想是怎样形成的。为了弄清楚人类思想是怎样形成的，还得分別談談两个过程：一是人类出現以前的过程，一是人类出現以后的过程。这两个过程是相聯的，又是有重大的質的區別的。

我們人是生活在社会中的，而整个社会又是生存在大自然中的。当人类出現以前，自然，或者說整个客觀物質世界，只是永远自然而然在运动，沒有思想。物質世界本来是没有思想的。但是，因为它永远在运动着，所以变化无穷。从无机物产生有机物，而蛋白質，而简单的和复杂的細胞，而原始的植物和动物，而由低等动物一步一步至高等动物，